

2.

反贪腐能否救党？

傅士卓 (Joseph Fewsmith)

贪腐问题在中国并非新事物。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抗议的学生，就在谴责“官倒”。三年后，随着邓小平1992年访问紧邻香港的深圳经济特区，天安门事件后实施的意识形态限制被打破，一场大规模的贪腐高潮也随之而来。据很有威望的经济学家胡鞍钢推算，至2001年，贪腐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经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13-16%。这个数字看似很高，但也反映出中国贪腐问题日益严重。然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央政府提供了五万亿元人民币 (约7,500亿美元) 刺激经济，引致一场新的贪腐浪潮席卷中国。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每年都会发布严厉声明，强调必须打击贪腐，但被抓和被起诉的几率仍然偏低。然而，习近平在2012年11月上任中共总书记后，随即展开的反贪腐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致力遏止贪腐行为。

为什么是现在？中国贪腐的问题历史悠久，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当局要开始打击贪腐？是否真的如一些人所猜测，仅仅是因为贪腐问题的严重程度已经威胁到中共以后继续执政？又或者是密切相关的原因，那就是贪腐程度，加上社会不稳、法治要求、全球化力量等其他因素，已经威胁到执政党的合法性？抑或是因为派系斗争？以上所说都是原因之一，但习近平反贪腐运动的具体原因，无疑在于已被解除职务的中共官员薄熙来曾试图推翻2007年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这次会议指

定习近平为下一任领导人)，为自己谋取领导职位。

薄熙来努力的故事确实令人惊叹，而关于这件事的一些细节无疑会在很长时间内，甚至永远，都无人知晓。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执政党一也就是中央委员会，尤其是以即将离任的国家主席江泽民为首的领导层一已经决定由习近平于2012年接替胡锦涛担任总书记。薄熙来甚至都不能进入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这个集中国家权力核心的细小机构。令人惊讶的是，出身于共产党官员家庭的薄熙来，父亲是在1989年6月天安门事件最紧张关头为中共做决断的“八元老”之一，会决心反对中共的决定。如果说中共有什么核心规矩的话，那就是必须遵守党的决定。就连后来被指控为分裂党的时任总书记赵紫阳，都不敢公开反对邓小平的断定，指天安门广场的示威人士是一群参与了“有计划的阴谋”的“极少数人”，目的为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和执政党。然而，薄熙来在重庆实行政策毫不费。身为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他在主政这个位处西南部的重镇期间，基本上把自己打扮得比北京的当权者更像是社会主义者。

不仅如此，薄熙来显然还会与他人密谋，以获取其已被否定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资格。如果还有比严禁违抗中共的决定更严厉的党内规则，那就是严禁拉帮结派，密谋对抗中共的领导。我们并不了解这场政治阴谋的细节，但正是习近平亲口证实了这件事。习近平指：

“在所有党的纪律和规矩中，第一位的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从近年来查处的高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案件看，破坏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问题非常严重，务必引起重视。这些人权力越大、位置越重要，越不拿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回事儿，甚至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包天的地步！有的政治野心膨胀，为了一己私利或者小团体的利益，背着党组织搞政治阴谋活动，搞破坏分裂党的政治勾当！”

这些话在党内已经算是极其严厉的措词。指控前政治局常

委周永康和前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才厚搞“分裂党”的“政治阴谋”，是自五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以来人们再没听过的重话。在2012年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它们道出了党内分歧的严重程度。

薄熙来在习近平成为总书记之前，就因为多项罪名被拘捕，所以他并非反贪腐运动迄今打击的184名“老虎”（高级干部）之一。但周永康、令计划和徐才厚等人的亲信显然都是反贪运动的目标。习近平的当务之急明显就是要清除政敌。

不过，反贪腐运动并不局限于政治斗争。事实上，正如打击薄熙来等人的斗争所表明的，更严重的问题是，党的纪律已经瓦解到会威胁其存亡的地步。无疑，在习近平和他的盟友眼中，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有可能使其灭亡的严峻挑战，程度丝毫不亚于当年击垮苏联共产党的那场挑战。正如习近平在晋升为党魁之后简而言之：“为什么苏联会解体？苏联共产党为什么会倒台？其一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理想和信念动摇了……最终，戈尔巴乔夫（Gorbachev）用轻轻的一句话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这样一个强大的党就此消失了”。习近平总结道：“（苏联共产党最后）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自此以后，他和身边的人就不断唤起对苏联解体的恐惧。一篇后来刊登在官方《人民日报》的重要评论中写道：“到今天，有着七十四年历史的苏联，已经解体二十二年。二十多年来，对于苏共亡党亡国的反思，在社会主义中国从未停止。”

究竟是什么让中国陷入这场合法性危机？正如习近平所指，就是失去了“理想和信念”。或者，假如习近平是一名学者，他可能会说，另一种强调“法治”和“制度化”的论述已经出现，意味着有利于政府制度化的共产党革命性使命将会结束。这个替代性议题是源自中共自己的言论。随着一场引发灾难性内乱的“文化大革命”结束，自1982年颁布新宪法以来，中共一直强调“法治”。实际上，习近平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曾宣称：“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

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

对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不幸的是他们以为这篇演讲意味着习近平将推动中国的自由开放，支持法治，而总的来说就是支持公民社会的出现。2013年1月，自由主义报纸南方周末》以习近平的“中国梦”和法治言论为蓝本，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梦，宪政梦〉的社论。“宪政”理念是源自过去十年发展起来的维权运动。其基本目标不单单是要运用法律来维护市民的权利，而且还要巩固法治，逐步迫使执政党完全在合法范围内执政，从而达到它所宣称的目的。尽管这一愿景为中国走上“和平演变”的道路带来希望，但同时也损害了执政党的合法性。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均察觉到这个危机，认为受到全国关注的《南方周末》社论是在推动中国走前苏联的道路。2013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九号文件，列出了七个不可公开讨论的领域，首先是“宪政”，但也包括“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闻自由”和“历史虚无主义”。

根据档案研究，“历史虚无主义”实际上就是指撰写优质、可靠和真实的历史，而这必然会与执政党认可的编史互相抵触。2013年12月，即大约是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前后，有关“两个三十年”历史时期的讨论开始出现，可见中共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关注。习近平和其他人已经清楚意识到，过分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也就是严酷的毛泽东时代——将损害后来的改革，就像过分强调改革可能会否定毛主席，从而否定革命本身的正当性一样。近年来，许多人都在问，近七十年前的一场革命，无论当时人们认为其有多么合理，怎么能够证明当下共产党继续掌权依然正当呢？作为回应，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发表了一篇权威文章，称“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政治哲学）将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这篇文章再次唤起中国对苏联解体的恐惧，称“苏联解体和苏联共产党倒台的主要原因，就是全面否定了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否定了列宁和其他领袖人物，实行历史虚无主义，扰乱了人们的思想”。

正如马若德 (Roderick MacFarquhar) 在文章中所述, 要致力支持习近平的领导一样, 反贪腐运动与对中共历史的解读和合法性问题直接相关, 因为贪腐问题的出现直接反映出共产党党员丧失了“理想和信念”。如果共产党党员失去了坚守的思想, 他们确实需要受到公民社会和法治的约束。但是, 如果能够通过打击贪腐来恢复执政党的纪律和理想主义, 我们就可以继续相信只有执政党能代表人民真正的利益和理想。

但真的是这样吗? 贪腐问题在中共党内广泛出现, 反映出中国社会更广泛的变化, 正如维权运动和其他民众运动反映出一个更多元、教育程度更高、更开放和参与性更强的社会的出现一样。这一个可以承认革命的历史价值的社会, 但同时认为未来会更“民主”, 却没有明确定义“民主”所代表的意思。然而, 这必定代表着某种更广泛、更具有监督作用的社会。这样的话, 社会存在的贪腐问题就不会侵蚀政治体系和社会习俗。

反贪腐运动至今已进行四年, 打下了184只“老虎”(定义为副部长级以上的官员)和数以万计的“苍蝇”(较低级别的官员)。然而, 奇怪的是, 并没有任何理论上的努力解释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贪腐风气。官方言论指责犯错的官员自私自利, 以权谋私。但是, 官方一直很少讨论究竟中共内部的结构如何带动官员贪腐。而且, 如果不坦率承认这些根本性的结构问题, 似乎就很难进行必要的变革以减少未来的贪腐情况。迄今唯一的结构性变化就是党内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督执法, 但中共似乎不太希望继续依靠这支“禁卫军”作监督。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其前身 in 执政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挥过持久的作用, 而在过去每当他们的作用被暂时提高时, 就往往会因为各种过激的行为而备受指责, 然后遭到削弱。因此, 目前我们很难看到究竟什么样的结构性改革能够控制贪腐问题、恢复合法性, 并消除人民对法治和社会监督的需求。

虽然反贪腐运动最初的目标是消除习近平的政敌, 但我们不应只是将这场运动视为派系斗争。尽管这也是斗争的一部

分,但这场运动更应被视作一次广泛努力遏制正在侵蚀中共合法性的社会变化浪潮的一部分。讽刺的是,习近平在短期内愈成功,长远而言政治和社会稳定所面临的风险就愈大。习近平和执政党需要以某种方式考虑整合中国正在出现的社会力量。单单只是压制它们是不足的。